

科
举制与
科
举学

刘海峰著

科
舉



贵州教育出版社

科 举制 与 科 举学

刘海峰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举制与“科举学”/刘海峰著.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9

ISBN 7-80650-529-6

I. 科… II. 刘… III. 科举制度—研究
IV. 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0145 号

科举制与“科举学”

刘海峰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邮编:550001)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字数 10.125 印张 2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529-6/D·25 定价: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金丰路 5 号 电话:6774152 邮编:550004

责任编辑：卓守忠 卢 玫 封面设计：张 彪



科举制与“科举学”

刘海峰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自序

科举制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古代的考试取士制度，“科举学”则是以科举制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学。

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事物能够将一千多年间的所有读书人联系起来,或者说有什么事物能够将分散的、独立的各朝政治家、学者贯穿起来,在成千上万的官员、文人中找到他们生活中的共同经历呢?只有科举。科举入仕,是一千三百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就像当代知识分子多数参加过高考一样,科举时代读书人从未应举的只是极少数。没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地影响过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俗。唐宋以后,科举制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具体制度中,科举制实行之早、历时之久和影响之大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许多事物或者昙花一现,或者影响有限,时间一久许多人便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而科举虽然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今天中国人普遍还略知一二,甚至边远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都可能讲出几个古时考秀才、中状元的民间故事,不少科场逸闻趣事至今还被大众口耳相传,足见科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么广泛深远了。科举制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教育、文化、文学乃至社会心理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历史上韩国(朝鲜)、日本、越南还曾模仿中国实行过科举制,欧美国家也曾借鉴科举建

立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因此,科举制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里对西方和世界的最大贡献。就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中国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科举制是其中难得的一种具有平等精神的政治文化制度,所以有“科举,天下之公”的说法。尽管它有不少局限,也出现许多弊端,但比起其他取士方法,还是更为公平和有效,一些士人也认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实际上清代以前多次废止科举的努力确也以失败告终。然而,19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科举在西学东渐大潮中也受到空前强烈的挑战。为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科举制也曾被加以改造,如增设算学科举和经济特科,1901年以后又废除八股文体,对正科考试内容进行革新,引进近代政治经济考试题目和西学,使科举制开始朝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但是,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非常强烈,而根基雄厚的科举制还带着其强大的历史惯性在运行,使得近代新学难以有机统合到这一复杂精细的系统中去。尤其是士人对科举的传统向心力客观上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致使张之洞等人认为改革科举补偏救弊已无济于事,非过正就无法矫枉,于是在1905年将科举制度连根彻底拔去。

世间的事物有的是靠得越近越为人们所关注,时过境迁便被人们所遗忘或忽视;有的则是近在咫尺虽被人看轻,离得越远却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科举便属于后者。在本世纪初,八股科举曾被唾骂为与缠足、鸦片、纳妾一样的腐朽落后的东西,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难得有人去触碰它。几十年后,人们才日益发觉科举这一尘封的历史陈迹也还闪烁着一些异样的光彩。于是,愈靠近20世纪的末尾,人们愈发重视研究科举,而且此一趋势有增无

减,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于是逐渐形成了“科举学”这样一门专学。

“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虽然汇聚成“学”只是近十来年的事,但其研究历史却有上千年之久。“科举学”是科举时代的固有词汇,古代“科举学”即“科举之学”,通常指的是如何考中的学业或学问,即应举之学或应试之学;当代的“科举学”指的是研究中国及东亚国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学科或学问。简言之,古代“科举学”是指备考科举之学,现代“科举学”是指研究科举之学。但古代广大读书人热中于“科举之学”留下了大量的资料,为今天研究“科举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科举学”是一历史名词,只是现今的“科举学”被当代人赋予了新的更为丰富的学术性含义,可以说是古语今用或古为今用。以往的科举研究多是分门别类的,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和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界都有不少学者研究科举,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有利于科举研究的细致入微,但却缺少交叉和综合。科举研究涉及许多学科,无论哪一门学科都无法全部包括,只有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达到对科举的全面认识和总体把握,“科举学”就是一门关于科举的综合性认识的学问。

自从硕士生期间开始接触科举研究以来,我治“科举学”至今已二十余年。特别是从1988年博士毕业以后,对科举研究的兴趣日渐浓厚。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的转折时刻往往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发展路向甚至命运。科举时代读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参加科举考试通常是重要的转折点。在这龙门关上,一旦中举及第,“鱼”可能戏剧性地化为“龙”,而名落孙山则是痛苦难言的经历。由于科举与一千三百年间知识分子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士人的喜怒哀乐往往集中在科考前后表现出来,因此研究起来兴味盎然,加上科举文献汗牛充栋、科举人物难以胜数,以往的

研究又存在以偏概全或误解之处，因此“科举学”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是一门精深引人的专学，导致我乐此不疲。除了几部专著之外，我陆续发表了长短不一的科举研究论文六十余篇。近年来，虽也有不少师友鼓励我将其结集出版，但因各种任务应接不暇，且觉得毕竟这并不是必须赶紧完成的事情，因此总是让位于更急迫的论著。2003年底，应贵州教育出版社编辑卓守忠先生的约稿，促使我从已发表的科举研究论文中选择出较有分量和价值者编纂成一本具有内在逻辑体系的专书，于是便有了现在这本《科举制与“科举学”》。为了保持历史真实，只作了个别的增删，主要是删减了几篇论文中少量重复部分。

科举时代提倡“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我很喜欢这句古诗，因为它具有一种非常高洁辽远的意境。前半句点出为学之道，鼓励人们勤苦向学。后半句描述的是具体如何苦读读书的场景，“萤窗”代表的是在没有电灯的古时候，读书人囊萤映雪或黄卷青灯寒窗苦读；“万卷书”则表明学问的高深，读书破万卷才能下笔如有神，所谓“卷”，即古代那种卷轴或线装书，给人一种古色古香、典雅珍贵的感觉。而这种“萤窗万卷书”的感觉和心境现在已很难得。近年来，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和大学及研究机构某些评价考核办法的诱导，人们的心态不易沉稳，往往急功近利，力图短平快地出成果。不过，真想为后人留下一点自己的东西，为学术踵事增华，还是要老老实实坐冷板凳，潜心钻研，厚积薄发，才能有所创新。就像下围棋者棋力不同段位不同一样，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功力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也具有无形的“段位”。不从事艰苦的原创劳动，不具有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的精神，只图方便快捷，轻轻松松地做学问，很难出精品出上品，也永远成不了高水平的学者。真学问是靠坐下来做出来，而不是靠“跑”出来“炒”出来的。

对从事学术的人而言，“板凳学问”与“行走学术”都需要。读

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行走是激发灵感和思绪的一种途径。一定的行走确有必要,见多才能识广。学术总是在交流和碰撞中不断精进,理论总是在研讨与激荡中日益深化。但当今更应提倡的是“板凳学问”这方面。古话说:“才须学,学须静。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在物欲横流的这年头,要真正静下心来做大学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然而,跑动多了心就难以静下来,所以行走要有个度,以便安静地坐下来写大块文章或个人专著。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一种解释是没有文采的语言文字无法广泛流传,我认为还有另一种解释:光有语言而没有形成文字,则不能流传远方或久远。可见,讲演的受众只是面前的一部分人,文章的读者则可以远在天边,影响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因此,相对与身体的行走,我更喜欢的还是精神上的行走,即让思想在脑际上行走,让激情在心弦上行走,让笔尖在稿纸上行走,让指尖在键盘上行走。

“萤窗新脱迹,雁塔淡书名。”我赞成让作品说话。论著本身的水平是最关键的,是否具有长远生命力取决于论著的质量,而不是其包装或人为加上光的光环。一本书如果不是真有价值,请多少名人作序或写书评、得过多少奖励都抵不过时间的淘汰,只有真正具有价值的论著才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若能够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就应实打实地做那些原创性的学问。学术精品需要长时间的细心打磨才能成型。就像打磨金刚石一样,需要耐心地从不同角度、顺着纹理进行认真研磨,方能打造出闪亮生辉的精品。一个学者应该有真正拿得出手的代表作或标志性成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非得要有坚强的毅力和艰苦的付出不可。我深信“天道酬勤”和“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要达到较高的境界,惟有自强不息。

子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处于不惑与知天命之

间,从不惑之年迅速向知天命迈进,最缺的永远是时间。时不我待,本书的出版正好是在科举制百年祭的前夕。2005年是中国科举制废止一百周年,将在厦门大学举办“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相信在2005年之后,海内外的“科举学”还将跃上一个新的平台,进入一个“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发展阶段。而本书的出版若能对“科举学”研究高潮的出现能起到些微的导引作用,则幸甚。

刘海峰

2004年5月1日

于厦门大学白城28号楼高层

目 录

自序	(1)
----------	-----

一、科举制的兴废

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	(1)
唐代秀才科的存废	(28)
唐代俊士科辨析	(51)
八股文百年祭	(69)
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	(83)
科举制长期存在原因析论	(95)

二、科举制的影响

知今通古看科举	(106)
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	(119)
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	(133)
科举传统与东亚考试文化圈	(151)
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172)
科举制对域外的影响:文化的迁移与回归	(200)

三、“科举学”引论

- “科举学”刍议 (219)
- “科举学”发凡 (232)
- “科举学”的世纪回顾 (245)
- 科举教育与“科举学” (262)
- 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 (280)
- 论“科举学”的广博性——以福建科举为例 (291)
- “科举学”：求解科举研究的最大值 (303)

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

科举制的起源是科举研究中最大的热点和公案之一。至今探讨科举起源问题的专文已有二十余篇,还有许多著作辟有专门章节参加讨论。对此一重要问题聚讼纷纭,分歧越来越大,各种观点林林总总,大约有十余种之多,已经到了令人莫衷一是的程度。尤其是主张始于隋文帝开皇七年说的日本著名汉学家宫崎市定所著《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史》二书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其简明新写本《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于七十年代译成英法文字之后,国际汉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跟着采用科举始于隋文帝的观点。包括美国人迈克尔·哈特《世界100名人排行榜》所列第八十二名隋文帝的主要政绩之一,便是说他创立科举制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①笔者认为,对科举制的起源问题很有必要正本清源,已到了应该取得相对共识的时候了。本文在回顾各种观点的基础上,从辨析“科举”一词内涵的演变入手,论述科举制的起源和进士科的起始时间,并着重与主张开皇七年说的学者商榷,希望能得出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以达到问题的相对解决。

一、诸家观点回顾

由于科举制存在时间长、影响大、变化多,其制度本身相当复

^① 见该书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332-333页。

杂精细,史书记载又有缺漏或矛盾之处,因而今人在论及科举起源时容易见仁见智,产生歧异的观点。大体归纳,有科举始汉说、始南北朝说、始隋说、始唐说、兼顾始汉与始隋说五类,而具体细分,还可分成十余种。因古今中外论及科举起源的学者和论著太多,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备列,只举出较具代表性者。

(一) 始于汉代说

近代学者较早主张科举始于汉代者为黄炎培,他在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一书序言中说:“如果真要说科举的起源,该说西汉。当时的考试制度,不早已分科射策么?但当时并没有全凭科举。”在28页中又说:“汉朝政治,有一件事,大概当时万料不到流毒至二千年以后。及今追究当时制度,总不免有始作俑的嫌疑,就是科举。”外国学者中,自从1938年德和美(Dubs)在《汉书》英译本第一卷中对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一事加以注释评论,认为这是文官考试制度的起始。^①由于英语中科举制度多译为考试制度,因而西方学者中有不少人主张科举制始于汉代。而一些专门研究汉代文官延揽制度的学者,更是直截了当地主张汉代的察举制便是科举制的先驱。^②论述科举始于汉代说者最为系统的是《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发表的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一文,作者认为汉代在整套科目体系中有不排除布衣入仕的常科、整个组织过程具有全国性和统一的步调、具有取舍放留意义的考试环节三大要素上,汉代的察举与唐代的科举基本一致。故汉代实为科举的初创期,唐代则系其完善期。

^① Dubs. Homer Hrsenpflug,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Vol. 1, Baltimore: Waverly Press, Inc., 1938, p. 259.

^② Franklin W. Hown, *The Civil Service Recruitment System of the Han Dynasty*.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1:1, p. 149; Has Bielenstein, *The Bureaucracy of Han T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32.

（二）始于南北朝说

唐长孺认为唐代科举中最重要的进士、明经两项科目,从形式上来看和过去的孝廉、秀才 有继承关系;秀才、孝廉考试科目的不同,也就是以后进士、明经二科之别;南北朝后期的举秀孝和南朝的明经射策从考试内容特别是从放宽门第限制上说已经为唐代科举开辟了道路。^①唐长孺还未明确说科举制始于南北朝,而万绳楠则明确称科举制始于梁朝。《梁书·武帝记》载天监八年(509年)五月壬午诏云:“负秩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术,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朝还有一些“入国学,明经射策甲科”入仕的实例。万绳楠认为这样的“明经”,和唐代科举制下“明经”一科,并无多少区别。从天监八年的壬午选法中,可以见到唐代科举制的影子。因此科举制实际开始于梁朝。^②

（三）始于隋代说

此说又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始于隋文帝时,其中又可细分为三种观点,其一为开皇七年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1946年出版的《科举》一书15至17页中指出:科举的起源宜由北齐以来逐渐重视考试的秀才科着眼,而不宜由进士科的创立着眼,迨开皇十八年废中正制度,秀才科考试完全归中央掌握,是为科举制度的起源。但他在十年后出版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中修正了其观点。在该书绪论中,宫崎市定认为开皇七年令各州每岁向中央举贡士三人,这种贡士大约包括秀才、明经和进士,进士这个名称在开皇年间就已经存在。在同书第520页他还举出《新唐书·房玄龄传》所载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从其卒年推算房玄龄举

^① 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见唐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第124~131页。

^②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35页。

进士当在开皇十五年,因此开皇七年制诸州举人为科举之始。1963年,宫崎市定又在其《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一书所附科举年表中,明确将秀才、明经、进士等科目为标志的科举制度起始时间列于开皇七年。岑仲勉在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通鉴隋唐比事质疑》第4页《进士科之始》条中,也认为开皇七年制定之贡士,“实唐代进士科之先声也。”发展至今,开皇七年说相当流行。其二为开皇十五或十六年说,吾师韩国磐先生于《历史教学》1955年第2期发表的《隋朝中央集权势力与地方世族势力的斗争》一文认为,进士科在开皇中已出现;并在1955年撰写的《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中指出,所谓科举制度,就是按照不同的科目来选举人才的选举制度;按房玄龄十八岁举进士推算,开皇十五或十六年时应已出现了进士科。^①主张科举始于隋文帝说中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始于开皇九年(589年),见贾志扬《宋代科举》一书,^②此说虽未加阐释,但估计是依据《隋书·高祖纪》所载开皇九年灭陈统一全国后,四月下诏令“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见善必进,有才必举。”这是以隋统一中国当年作为科举始年。

另一派认为科举制始于隋炀帝时,此派观点也以进士科的出现作为科举起源的标志。具体又可细分为四种。一是认为始于大业元年,陈直以1920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所载“公弱冠及进士第……以大业二年卒”为据,主张进士科始于炀帝大业元年。^③二是认为始于大业二年,此说以《通鉴纲目》将进士科

①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第294~297页。

② 贾志扬(John W. Chaffee):*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

③ 陈直:《古籍述闻》,《文史》第3辑,1963年10月。